

从“照着讲”到“自己讲”，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张立文

思想人生②4

从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我从事中国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已近70载。一路走来,我见证了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担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使命,推动中国哲学经历了“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自己讲”等阶段。身为其中一分子,我始终认为,中国哲学要创新,就必须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中国哲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这也是我为之孜孜以求、奋进一生的目标。

自幼年起,我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在小学的寒暑假,家人怕我在家调皮,便把我送去了私塾念书。那几年的时间里,我先后接触了不少古书如《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古代思想家崇尚的立志、修身、博学深深影响着我。我暗自下定决心,要以文立身、以文化人。

1956年,党中央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我也产生了考大学的念头。当时我已经在温州泰顺工作了6年,虽然农村工作很忙,但我仍然抓紧一切时间复习高中功课,并如愿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从边远山区泰顺到古老繁华的首都北京,我内心特别激动,不仅是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善,更是因为获得了实现人生目标的机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我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知识,既延续着自己的爱好,多多阅读中国的古书,也接触了不少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我发现西方哲学家并不认可中国的哲学范畴。黑格尔就曾说过,“东方的思想就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之外”。然而,在古希腊语里,哲学代表着爱智慧,我想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追求智慧的权利,也都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产生思想,这不就是哲学吗?不能因为理论概念、逻辑不同,就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如何打破西方对于中国哲学的误解?这成为推动我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大学毕业后,我被提前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对于我的学术生命来说,这是一件大喜事,也是符合我学术兴趣的大好事。我获得了十分难得的学术起步机遇,让一直以来积累的中国古典文化有了运用的机会,使我得以实现学术上的向往和抱负,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

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我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要做中国哲学研究,必须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为了强化自己的古文基础,我专门去北京大学选修“文字音韵训诂”课。当时哲学界流传着一句话:没有一个哲学家不研究《周易》。因为《周易》是中国古典哲学典籍中最难理解的,也是检验研究者古文功底的试金石。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查遍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相关资

料,完成了《周易》全书的注释,并在1980年出版了《周易思想研究》一书。

在研究《周易》的同时,我也关注宋明理学的研究。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又一座高峰,有着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尤以理学和心学为盛。要想透视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就不能绕过朱熹、王阳明等哲学家的思想。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从朱熹入手,通过对他的哲学思想研究,由点及面、由微观到宏观,进而把握宋明理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1981年,《朱熹思想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令我感动的是,张岱年先生为此书写了推荐信:“张立文同志此书对于朱氏体系的各个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说明,对于朱氏学说中的细微曲折之处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条理清楚,论证详明。”此后,我还完成了《宋明理学研究》,这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宋明时期诸大家的合论。

这两段经历是我真正走上学术研究的起步。正是在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中,我开始思考: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思想系统?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那时探讨中国哲学家容易局限于会误解中国没有哲学、心的对立中,而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或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是由诸哲学范畴构成的。西方哲学家之所以会误解中国没有哲学,就在于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哲学范畴和逻辑结构。我们要打破这种误读,就应明白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既不能承袭西方的“分门别类”,更不能割足遁履地适应现成的原则、原理,而是要从实际出发,梳理总结中国哲学固有的原则、原理、规律、方法。

由此,我写作并出版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和人道篇。在这两本著作中,我依据范畴的性质、含义及其内在联系,对其加以整理、排比、综合,系统地确定各个范畴的地位与作用,并按照范畴的历史顺序和逻辑序次,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体系。比如,“阴阳”作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我梳理了它从先秦到近代的发展情况。为了梳理中国哲学独立的逻辑结构,我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构想,并出版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和人道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出版以后,在国内国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少哲学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会运用范畴逻辑结构的分析方法,韩国、日本等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更是将这几套书作为案头必备书。这让我更加坚定一个信念:要自觉地构建中国独立的哲学体系,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20世纪80年代,全国掀起了蔚为壮观的“文化热”。在思想解放、时代变革和学术发展的共同推动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热潮。在这波热潮中,有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保守、封闭的,它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我并不认同此类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思维、行为方式经由五千多年的历史,已然凝聚在中国人的血脉中,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比如儒家倡导的“忠恕”“仁爱”等思想,就是厚植于中华民族的重要底色。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绝不能靠彻底与中国传统断裂而获取;现代化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也不能靠简单地全盘打倒传统而获得,而只能对传统进行综合创造。为了阐释自己的观点,我写出了《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主张将传统学从文化学中分离出来。在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在不断地凝聚、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创造,对于好的传统,我们必然要继承,不能因某一时的文化风潮就一棍子打死。

在研究传统学的过程中,我在思想上已然摆脱了“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的教条模式,有了“自己讲”的觉醒。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哲学大致经历了“照着讲”“接着讲”两个阶段,当时的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原生型的,只能“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又经历了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着讲”。“自己讲”则是要毅然地排除一切干扰和执着,卓然独立、自作主宰地自己讲。

在我看来,出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根结就在于中华文化自身的主体性不强,而要想树立文化方面的主体性,我们就必须创新、创造。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我认为这否认了人的能动性 and 主体性,并在《新学人导论——中国传统学人的省察》中,提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合和存在”,人需要追寻人生价值意义,并在追寻中迸发创新创造的生机活力。

四

在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专门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真切认知,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显辉煌的憧憬,使我深刻认识到:唯有依据中国哲学本真,自下定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自己讲”,才能在世界哲学之林中获得自己独立的、应有的地位、价值和话语权。

21世纪之初,人们都在思考人类将走向何方,我亦是如此。在经过充分观察和思考后,我总结了新世纪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即人与自然冲突产生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带来社会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产生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带来精神危机、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产生价值危机。

面对五大冲突危机,中国哲学能在多大程度上作出化解和贡献?我认为,这关系着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重生。为此,我构建起了“和合学”的哲学系统,并于1996年出版了《和合学概论》一书。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尚和合”的传统。“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国语·郑语》,有和谐、相合之义,之后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庄子讲:“与人者和,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我从古典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总结提炼,赋予“和合”新的内涵,即自然、社会、人文、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在相互冲突、融合的

动态过程中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与西方文化提倡的竞争和博弈精神不同,和合学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希望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更好地应对、化解人类社会将会面临的矛盾与冲突。

刚提出“和合学”理论时,我也听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些人认为和合丧失了党性原则,是“和稀泥”,不讲斗争,也有人认为和合学模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但我心里清楚,和合学的根本在于讲和平、合作,是符合世界人民要求的,也更加坚定要做好和合学的研究。

在我和一代代学生的努力下,和合文化逐渐被大众所熟知。尤其是在当下,西方文化思维中的对立竞争、非此即彼,已无法适应世界发展大势。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只会割裂相互依存的世界。而中华思维中提倡的和合共生、和而不同、多元包容,正契合了当今世界的实际需求,为世界大同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表示的: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

中国哲学应走向世界,这是几代中国学人的愿望,并为之不懈努力。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希望以自己对于时代精神核心话题的体认,讲述中国哲学对安心立心、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至诚追求,让中国哲学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已九旬高龄,但我仍然关注着学界的前沿动态,保持思考、写作,朝着目标不断追求,以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名家小传



张立文,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率先构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新入学理论体系;构建了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五大原理的和合学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出版《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哲学论》《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等专著35部。主编《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学术通史》《国际儒藏·韩国编·四书部》等40余部著作,并由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出版《张立文文集》(38辑)。



扫一扫 看视频

育的“红立方”。其次是提升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效能,形成“大思政课”育人新格局。同时,深入挖掘第二、第三、第四课堂的思政教育元素,将思政元素与校园文化、实践体验、国际视野、全球素养的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化人才。

服务青年打造青年发展型城市共同体。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近年来,高校党组织围绕如何让青年人才有用武之地、多维引领青年与城市共荣相生,青年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双向奔赴”。聚焦青年“所需所盼”,校地联动打造青年文化街区、青年小店、青年夜校、青年城市“会客厅”等,丰富青年文化生活;实施青年优居计划、打造梦想小镇,帮助青年人才安心栖居,共同创新创业、追梦圆梦;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青年人才以创新赋能成就城市发展,实现人才与城市相互成就。聚焦青年“可感可及”,立足城市大赛赛会和国际化文化活动,将志愿服务与人才培养有机融通,打造青年志愿者的服务驿站,让高校组织多元化育人实践的价值。伴随着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断优化,青年与城市有机地形成学习共同体、栖居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奋斗共同体、价值共同体。

【作者为浙江外国语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之江青年论坛

体育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又是推进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支点。在新时代背景下,体育教育正逐步从“强体”向“铸魂”转型。体教融合的推进,不仅是国家战略的深层布局,也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体教融合的核心在于通过体育课程实现知识和价值的结合,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团队精神和坚韧品格,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体教融合的内在逻辑

体教融合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体育教育通过身体运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帮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和内化价值观。比如,足球教学中的越位规则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篮球战术训练则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这种“做中学”的教育方式,比单纯说教更具感染力,能有效将抽象的道德规范转变为具体的行为模式。现代教育心理学强调,价值观内化需要经历认知、情感、行为三重机制。体育教育的独特优势在于,它能够通过运动情境同时激活这三个机制。实践表明,参与团体运动的学生在责任感和规则意识上明显更强,充分证明了体育在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一代中的独特作用。

体教融合的现实问题

首先,政策层面体育教育存在“悬浮化”现象。虽然国家多次强调体教融合的重要性,但基层落实仍面临障碍。一些地方学校未能配备足够的体育教师,部分农村学校缺乏标准的运动场地。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评价体系的错位:当升学率仍是学校的主要考核标准时,体育往往会被边缘化。

其次,课程设计层面体育教学存在“碎片化”问题。技能训练过于注重动作分解,教学过程过于程式化,如“集合、热身、解散”这样的固定模式,使体育课变成了“放羊式”的自由活动,失去了应有的教育功能。

最后,社会认知层面存在对体育教育的理解偏差,尤其体现为家长群体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家长希望通过运动增强孩子的体质;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体育活动占用孩子的学习时间。这反映出公众对体育功能的片面理解——仅将其视为“强身健体”的工具,而忽视了其在“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

体教融合的实践路径

当前,克服现实困难,推进体教融合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课程创新,构建“体育+”育人体系。新时代的体育课程改革应将体育场变成一个“价值观养成”的课堂,整合“体育+思政”“体育+劳动”和“差异化教学”等模块,既强身健体,又塑造品格。

“体育+思政”的核心在于将运动场景转化为德育的现场。当学生在篮球课上学会“传球”时,他们不仅掌握了运动技能,更理解了团结协作的重要作用;当他们在长跑中坚持到终点时,收获的不仅是体能提升,更是对“永不放弃”这一人生信条的切身体验。“体育+劳动”强调通过运动后参与校园劳动,如维护运动场地或整理体育器材,让学生明白“美好环境需要双手创造”。这种直接的体力付出与劳动成果的关联,比传统书本教育更生动、更深刻。差异化教学即关注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对于体能较强的学生,可以挑战更高难度的体育项目;而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则从简单项目起步。通过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所有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水平的体育锻炼中获得成就感,避免“一刀切”带来的挫败感。

二是师资建设,让体育教育者从“教练”升华为“育人者”。在体教融合的过程中,体育教师的角色需重新定义。教师不仅是运动技能的传授者,更应是价值观的引导者。这要求教师具备“双专业素养”——既精通运动科学,又懂得教育规律。比如,在排球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纠正学生的传球姿势,还要抓住模拟比赛时的冲突,引导学生理性处理争议,利用课堂作为品德养成的实践场。同时,体育教师的来源渠道也需要拓展。比如,浙江省体育局联合省委编办、省教育厅、省人社保厅、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出台了《浙江省大中小学校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为包括退役运动员在内的体育人才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提供了政策遵循。

三是评价改革,建立多维度评估体系。新时代的体育教育评价应突破传统“秒表+米尺”的单一评价方式,构建包含“体质水平(40%)+运动技能(30%)+体育精神(30%)”的复合评价体系。其中,“体育精神”的评价可通过具体行为指标量化——包括规则遵守、团队贡献、意志品质等多个维度。比如“主动扶起摔倒对手的次数”“遵守裁判判决的自觉性”等。这种评价方式将隐性的品德行为显性化,成为可操作的价值观教育工具。

四是建立协同机制,构建育人共同体。其中家校联动与校社融合是两大关键环节,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家校联动强调家庭与学校的密切合作,家长作为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应与学校保持良好的沟通,共同关心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通过定期家长会、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形成体育教育合力。与此同时,校社融合则注重学校与社会的深度合作,学校不仅要为学生提供文化教育,更要通过与社区、企业、文化机构等的合作,拓展学生体育活动的空间,培养其社会责任感与实践能力。通过整合家校社各方资源,可以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体教环境和更广泛的成长平台,形成一个多维度、全方位的育人网络,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新书推荐

《生生之道:中华文明宇宙观》一书是一部跨学科对话的学术文集,汇集了十二位来自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学科的学术大家的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阐释中华文明宇宙观,展现中华文明之道,探求对中华文明的深层理解之要义,是一部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

十二位知名学者围绕中华文明宇宙观,从哲学、历史学、文学、文字学、社会学、建筑学、科技史等角度,就中华文明宇宙观与中国智慧、人文与自然、山林与社会、天人合一与人生境界、大一统与文化地理、甲骨文与殷商宇宙观、紫禁城的文武建筑布局、宋代家礼等议题,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宇宙观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格。每位作者学养深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精研覃思,行文流畅,从不同角度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之道”。相信不同学科背

景、不同传统文化功底的读者,均可从中汲取智慧,涵养心性,立足当下,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更加自觉自信地赓续光荣中华文明。

打造校企地党建共同体的实践进路

周明宝

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浙江省委要求推动高校党建与属地党建相融合。高校要用融合发展的方式创新党建工作,以系统思维提升党建工作水平,探索构建高校—企业党组织相融共生兴业型、高校—地方党组织互动发展共进型、高校—社区党组织志愿服务实践型等党建新模式,以组织大平台的“组团式”“兵团式”党建创新生态,凝聚形成体系化校企地党建共同体。

校企地党建共同体以书记手拉手、党组织心连心、文化走亲为形式,以组织融合、发展融合、资源融合、品牌融合、感情融合为内容,形成新时代高校基层组织形态的创新实践。目前,主要呈现出产学研用共同体、基层治理共同体、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共同体、青年发展型城市共同体等典型发展样本。

适应经济转型发展打造产学研用共同体。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是将科学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铸就持续发展动力的基本方式和重要路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重构产学研用协同育人体系。近年来,高校着力提升党建战斗力,充分发挥组织、人才和科

技优势,吹响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集结号”,打造产学研用共同体,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大力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应用。紧紧围绕企业和地方重大发展战略,构建“党建+科研+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持续探索共研、共创、共享、共赢合作发展模式。聚焦市场化、技术型、应用性和企业出海国际化需求建立“菜单化”合作项目,通过专业课程建在产业线、生产线上革新,探索建立基于人才共育的实践教学基地、国际化实践基地、实习就业实践基地以及基于项目联培、技术共研的蹲点实验室、产业研究院、科技孵化园、战略规划院等,形成创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针对“卡脖子”科技难题,选派党建与业务工作“双带头”的复合型人才联合攻坚,实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和国际科技力量博弈“新战场”融汇的实战化训练,力争在科创肩并肩和创新背靠背的集智攻坚中,产出揭榜挂帅的科技前沿成果,锻造国家战略人才队伍。

回应社会需求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近年来,高校着力构建“党建+社会服务”的组织设置方式,以“我为群众办实事”

“民呼我为”“企呼我应”为要求,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打破与周边毗邻地区或属地城市单位的区域物理空间和行政管辖限制,坚持党建统领和融合发展理念,以党建赋能公共文化、服务城市文明、服务基层治理等,以党支部、团委、学生会和青年学习小组、青年理论宣讲团、青年志愿者服务协会为两翼,以师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团学骨干为生力军,积极与周边社区和公共服务部门对接,通过“校社融合”与“校地共建”,凝聚各主体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打造“党建+”多元化社会服务体系,形成“党建+N”的校地联动、品牌联建的发展矩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服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铸魂育人打造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共同体。教育的使命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近年来,高校组织国际推进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通过强化党建引领“思政育人”,打造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共同体。首先是切实发挥思政课关键课程作用,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办好大中小学思政课,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纵向贯通、横向衔接、全域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以教学共研、教师共培、课程共授、资源共建、效果共评为载体,打造有风景的思政课,形成汇集思政教师、教材、课程和红色教育资源多种力量耦合教

推进体教融合 创新育人途径

崔英敏

重要窗口 理论周刊·知行